狂欢下的隐忧

董海军 上官郁文

屌丝多指在人力资源、经济资源方面与参照群体高富帅相比,处于劣势之中的一群青年群体,多使用"矮、矬、穷"等词形容自身,实则是生活较平庸、感情空虚、缺乏自我存在感、不被社会认同,而又渴望获得社会的认可。屌丝起源于百度贴吧,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网络社会的语言表征,同时由网络虚拟社区进入日常的生活之中,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并解释屌丝呢?笔者认为,屌丝是一种低俗语言的日常化自嘲,屌丝文化是解构主流文化的底层亚文化。

痞俗语言的日常化

网络热词是借助网络平台获得广泛传播的网络词汇,它所代表的意义往往不再局限于词语本身的含义,而反映着网民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和态度。2012年12月25日,互动百科联合其他机构共同发起的"2012互联网十大热词及年度汉字"评选活动中,屌丝入选年度十大热词。

屌丝的入选表明了一个本难启齿的低俗词语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低俗语言日常化的机理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屌丝的日常化在于低俗语言的解构功能。屌丝文化是一个底层亚文化,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式底层革命反抗文化、"小姐""同志"等这些日常称谓的低俗化文化类似,同样是解构主流的底层亚文化,当然,屌丝的路径正好相反,是低俗语言的日常化,体现了对自我的解嘲和对社会现实的反讽,是解构性文化的一种形式。解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颠覆和破坏,如果无法正面颠覆与破坏现存主流的结构,"自毁"同样是一种解构。

屌丝是青年人对自己所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地位的一种感知,与韦伯使用的权力、声望、经济三个维度进行客观分层不同,这种分层是一种主观性的分层。在这样的分层中,原本被认为是精英层次的白领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不如意及压力而将自身划分入屌丝的行列,解构了原有的社会分层壁垒,契合了现实社会的压力环境。媒体通过放大和渲染屌丝的行迹,使得屌丝文化迅速在网络社会中蔓延,成为一种阵发性和及时性的文化潮流。

屌丝文化是一种底层亚文化,屌丝文化的话语表征底层意识,他们对于现实充满批判而又不具备改变的逆袭条件,只能采用口头方式进行话语的表达,通过"自毁"式自嘲来解构精英主流,逆袭高富帅。这反映处于底层的屌丝受众有改变现状的想法。有人认为此为不良情绪,实则不然。"屌丝"文化不过是一种新的网络亚文化的崛起,它意味着中国人更多地获得了自己诠释生活的角度与权利。从这个意义上看,屌丝文化是网络文化的一种进步。

日常化兴起的动力

解释性是解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所要解构的目标进行阐释和说明。屌丝文化的兴起如何来解释呢?语言是流行文化的有效表征形式,屌丝作为新时期的网络流行语,能够风行网络的动力是多元化的。屌丝文化凸显了屌丝与高富帅的阶层对抗,是一种弱势群体心理压力的释放,是一种底层群体的狂欢,迎合了受众低层次的审美情趣和感官刺激。

对内来看,屌丝文化触摸了底层青年的私软处。"屌丝"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定位和自我认同,并具备相应的社会心理构成。一般来讲,"屌丝"作为网络青年群体性话语,展现出对于自身不利的发展状况或居于弱者地位的相对剥夺感。屌丝的自我界定为社会分层压力下的底层青年提供了情绪自慰以及挫败后的自我归因等。屌丝文化起到了社会安全阀作用,这种口头的情绪自嘲和失败后的自我归因,是对中国传统中失败挫折后的环境归因的一种解构,与"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不屑狂妄不同,"我是屌丝别怪我"是对自我受挫的维护式归因,强调不可比的先赋性因素,回避比较,避免自尊受侮。对高富帅比较群体的知觉主要是"羡慕嫉妒恨",将其成功归因于先赋性因素。这种口头的情绪表达有助于青年宣泄自身的情绪,对社会的反讽和自嘲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屌丝反映出底层青年在对"官二代"、"富二代"的集体敌视无功后转向集体自慰,希冀通过抱团取暖,维持内心平衡和谐,达到认知协调。

对外来看,屌丝文化契合了低俗大众性的刺激煽情。在消费主义盛行且文化需求旺盛的时代,人们尤其热衷于观望、追捧各种文化快餐,网络文化影响青年思维的能力也日渐明显。屌丝族最善于学习跟随娱乐时尚先锋,他们把所有压力都释放于一切可以疯狂的娱乐行为。屌丝以其煽情、感官刺激的手段吸引受众,获得了青年网民的传播,适应了开放的网络环境。发达的网络媒体为这一自嘲自勉的运动添油加醋,推动了其辐射的范围和影响力的扩大。互联网具有的议程设置的功能,进一步放大了屌丝的曝光率。商业化运作的盈利机制捕捉到这种集体狂欢的流行动力并加入共振性散播。这种商业化的运作背后,是网民纷纷追踪时尚的脚步,扮演消费者的角色,享受这场屌丝文化盛宴。根据近几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网民的主体是青少年群体。从某种程度来说,屌丝是属于青年的词汇,屌丝文化消费的主体是青年人。屌丝文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有效互动,进一步推进了屌丝的传播和应用。

狂欢下的隐忧

屌丝这种痞俗概念及由其推导出的解释性特性则提倡各种解构的平等与共存,是积极与和平的解构。同时,我们需要从这种解释性解构中看到底层青年"自毁"解嘲中的无奈与呐喊,关注青年社会发展机会的公平与正义,同时更应该看到社会的文化隔离。

隐忧一:青年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屌丝作为弱势群体借以自慰和自勉的自嘲称谓,受到众多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的热捧,在于屌丝与高富帅的对抗中力量的二极悬殊,具有矛盾冲突的剧情性,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平情绪增长的反应,是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矛盾发展的缩影。社会结构本身限制了某些社会成员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资源、掌握话语权并达成自身目标的机会,于是,一种无力感和被剥夺感蔓延开来,并以一种近乎网络狂欢的方式释放出来。"屌丝"族表达了对当前国家社会群体分层与现实生存现状的强烈抱怨。伴随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中国社会正在急剧地走向阶层分化,在市场和权力双重机制作用下,教育、婚姻、求职等涉及地位获得的诸多领域存在不公平不透明的问题,以"拼爹游戏"的形式维持着代际继承的再生产,加剧社会阶层的封闭。"潜规则""萝卜招聘""我爸是李刚"等社会非公平现象不一而足,诸如"官二代""富二代"的"二世代"问题逐渐成为社会讨论焦点。这种代际及代内社会发展的非公平,阻碍了社会流动,降低了个体通过自我奋斗实现价值的能动性,并引发群体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当前社会管理与社会中,需要避免"X二代"现象,而不宜掩耳盗铃式排斥或贬损社会底层的声音,导致贬损者最终被贬损的局面。

隐忧二:文化隔离。屌丝一词在2012年代表精英主流的《咬文嚼字》十大网络热词的评选中没能入选,评审者认为屌丝这个词是一个粗陋、低俗的词汇,因为屌在一些地方的方言中是男性性器官的意思,恶俗趣味明显,这违背了它们评选的原则。作为评选方的《咬文嚼字》以高雅自居,这相对屌丝内群体而言是外群体。据以往的研究,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明显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内群体对于群体内成员的价值观是认同的,对群外成员容易出现排斥甚至屏蔽的行为。屌丝文化是一种对主流文化进行了解构的亚文化形式,主流文化在面对屌丝文化时会出现不能理解甚至产生文化震惊。应该加强内外群体的交流,来消除这种相互之间的不认同不理解,阳春白雪需要理解包容下里巴人,实现"文化平权"。

潮音阁

对『藏彝走廊』的人类学审视

张原

2008年"5·12"大地震后,笔者赴汶川灾区开展人类学调查,在为当地的村民举办防灾知识培训时讲过一句话:"经灾不遇险,逢凶能化吉。"这句话是想说明,虽然藏彝走廊地区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带,但不应成为一个陷于灾难困境的地区。因为只要人类的社会文化系统控制得当,许多自然灾害未必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些年来,通过对藏彝走廊地区灾害场景的人类学考察,我更加明确了要想在当代中国建立一套有效的防灾减灾和灾难应对机制,我们必须对灾害发生的社会文化机理加以辨析,并就灾难应对的社会文化机制进行研究。所谓"天灾人祸",恰如美国人类学者布莱基等人所强调的,灾难其实是由环境的破坏性因素和社会的脆弱性相叠加而生成的。然而"天灾可避,人祸难除"。灾害场景的生成凸显的是一种植根于人类生存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中的脆弱性,其肇因更多地隐含于人类的社会文化系统之中。所以,今天当我们遭遇各种灾难之时,就不应夸大灾难的自然诱因,而要仔细审视在自然灾害演变为灾难事件的过程中,所隐含的那些深刻的社会文化肇因。

"藏彝走廊"作为人类学区域研究的一个学术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提出的,其地理范围基本覆盖了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的核心地带。历史上,这里是中国各民族南北迁徙的主要通道和文化交汇之所,今天则是汉、藏、羌、彝等各民族互动交融的主要区域,当地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复杂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文化多样性的代表地区。由于其地貌特征的丰富多样、气候环境的复杂多变,以及多条活动性地质断裂带的存在,使得藏彝走廊区域内各类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近年来,除了我们熟悉的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和今年刚发生的雅安芦山地震这样的大灾之外,这一区域还频发诸如雪灾、旱灾、泥石流等各类自然灾害。然而这些灾害现象并没全部演变成灾难事件,所以应对其进行一定的辨析,以确证这一地区遭遇了何种灾害场景。

在人类与环境系统的长期互动过程中,藏彝走廊地区的各种灾害现象,一方面作为当地生存环境的一种显性特征,能够被特定的文化生态和社会应对机制化解为一种可适应或可克服的环境要素;另一方面,则可能在具体的历史变迁过程中,被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结构导向一种人类的脆弱性,从而生成为一种灾害场景。今天的藏彝走廊地区,其灾害场景的生成似乎呈现出一种井喷趋势,各类灾害频发让人应接不暇,多地受灾罹难使人唏嘘不止。究其缘由,并非仅是由于各种自然灾害在当地短时间内集中出现,而是因为这一地区在一种"发展主义"话语的主宰之下,其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体系均承受了一系列压力,进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面临着可持续性的危机。特别是在将经济增长视为社会进步之先决条件,进而将经济增长完全等同于社会发展与美好生活的观念的主导下,当地居民的生计方式和经济模式在最近20年发生了急剧变迁,使得那些植根于自然环境系统中的破坏性因素和社会文化体系中的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灾害所导致的风险在强度和广度上也被放大。

在这一区域,一个最普遍的例子是外来经济作物被规模化引种所引发的灾害场景的新变化。过去,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相对于地质灾害的突发性而言,气候灾害的发生在一定的季节周期和地域范围内具有较明显的常态性和规律性,对当地社会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也主要体现在经济生产方面。由于当地各民族传统中的信仰、习俗、节庆、禁忌中蕴含着许多应对当地气候变化规律的策略和社会组织安排机制,大多数气候灾害都具有可控性,即使演变为灾难,其影响范围也限于局部。今天,由于一些新近引种的经济作物的生产收获期要比当地传统粮食作物的时间推后,这就使得原本传统的生产时空安排被瓦解,如在一些地区,农历十月之后不务农的禁忌被打破。这就使得过去常见,但对社会生活影响较小的冰雹雪灾等灾害现象,成为直接影响作物收获的灾难事件;而现代规模化单一经济作物的农业生产模式,在气候灾害面前凸显了一种前未有的脆弱性;最为关键的是,在这种新兴的以经济作物种植为取向的生计方式后面,当地居民的生活所需基本是来源于市场,所以作物一旦受灾绝收,其灾难性后果就不再是局部的。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新观念新事物的进入不可避免,然而我们在推动经济变革时,未必要以生态性的灾难为代价。在当前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十分重要和紧迫,特别对于诸如藏彝走廊这样的民族地区而言,其意义不仅在于当地防灾减灾事业之进步,更关系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之持续。

今天,对藏彝走廊的灾害场景加以人类学的辨析,恰能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目前所面对的灾害场景带有明显的复合特征和时代特点,其凸显的脆弱性正是现代化变迁中的一种结构性与过程性的产物。特别是在藏彝走廊地区,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与当地社会变迁的剧烈性加深了灾害场景的复杂化,也由于当地的各族群也都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体系和历史过程中应对具体的灾害场景,这一地区应对灾难的经验也存在着明显的族群差异和地方特征,这就更需要我们应进一步地拓展和丰富灾难考察的理论视野与研究经验。

实际上,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就是要通过关注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的复杂互动,来认识灾难产生的社会文化肇因,考察不同人类群体如何借助社会文化资源来认识和应对灾害的经验图景,这并非只是关注灾害场景和灾难应对本身,而是要理解人们的生活世界在可持续性道路上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挑战和机遇。考察藏彝走廊的灾害场景,恰能让我们从一个具体的但却具有典型性的地方出发,来拓展我们认识灾难的观察视野和创造可持续性生活世界的思考纬度。

微点评

管束非正当消费有利于经济增长

缘起:统计数据显示,由于中央坚决执行八项规定,集团消费和公务消费大幅下降。很多高档酒店、饭店的生意趋于冷落。坊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住宿和餐饮行业的下滑,对经济发展是损失。

文力谭点评:经济统计在自然意义上是不会考虑道德因素的,一个区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不会因为其中交易活动的不规则甚至违法而不对其进行经济数据的统计。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统计。因此,由于八项规定对非正当消费的约束,确实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某些方面的经济统计数据的下降。但是,难道我们应该为了经济统计的需要而纵容奢侈浪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不仅仅因为,这种严厉的管束不仅在塑造政府形象和净化社会道德层面振奋人心,赢得民心。更重要的是对奢侈浪费的管束,从长期而言恰恰是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因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不可能持久建立在畸形的消费模式之上。20世纪经济学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把经济学的思想起点放在"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上,这就是制度经济学派的核心主张。任何人的经济行为都是一个社会人的行为,都要受到他所在社会的制度、体制、法律、道德等因素的制约,这就从文化层面深化了经济学的视角,从而为更深层次观察经济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不仅如此,这种经济学观点还有助于把经济统计建立在更积极健康的经济活动之上,从而有助于物质财富的真正积累和扩大,促进社会进步,造福人民群众。

海外流失文物:1700万个耻辱

缘起:法国皮诺家族日前宣布,将向中方无偿捐赠流失海外的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首。2009年,这两件兽首曾在法国巴黎被拍卖,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和谴责,中方也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皮诺家族从文物原持有人手中买下了这两件兽首,并向中方表明无偿捐赠的意愿。

文力谭点评:我们可以从跨国企业管理智慧的角度来理解皮诺家族的捐赠行为,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认识到他们在事实上的确做了一件高度符合国际道义和当代文明发展趋势的事情。但是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至少在1700万件以上,有人把这种文物称为文化的孤魂。这些文物丧失了和中华民族母体文化的联系,寄身新老霸权国家的公私场所,每一个都是帝国主义者贪婪欲望和道德耻辱的象征。这些文物仍然大量被海外占有说明,一种丛林心态仍然不可忽视地存在于冠以文明头衔的西方社会中。我们当然不苛求侵略者的后代完全代偿祖辈的道德和文化债务,但是他们如果不认真检讨祖辈思想和行为中的幽暗之所,他们就不可能彻底走出旧时代的泥淖,走向崭新的文明生活。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说:"我们可以等,一直等到他们对自己前辈不光彩的行为有所愧疚的时候,自动把东西退还给我们。"这些文物不在中国一天,就是文明的耻辱存在的一天,只有1700万孤魂尽数归来,他们才有可能求得心灵的最大安宁和平复,并获得新的前进的希望。

没有爱,知识也能变祸害

缘起:复旦大学黄洋因舍友投毒而亡,两天内,媒体又报道了两起校园暴力事件。4月16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蒋某因宿舍开门的争执,刺死同舍室友袁某。4月17日晚,沙洲职业工学院经管系学生符某因悲观厌世,为了排解压力将该学院学员曾某刺伤。

文力谭点评:这些学生和其他大学生一样应该是享受文明思想和行为训练较多的天之骄子,但是毁灭性的暴力心态,反映出他们心灵深处对生命的漠视和仇恨。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可能爱别人,反过来,一个不爱别人的人,由于心灵的封冻,也不可能真正爱自己。这些具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其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有些心理学家所谓的独生子女的人际关系失衡问题,而在于他们心灵世界的荒芜和虚无。在掌握着我们未来的未成年人和青年群体中,到底有多少人的内心已经熄灭了对他人的热情和同情,对自己的自信和自重?这是包括家庭、学校、政府等各个教育行为主体都需要认真反思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我们教给孩子们多少知识,如果没有激发起他们对人世和生命的深沉之爱,这些知识都无助于生命的美丽,甚至还会变成冷酷和残忍的同谋。杀害黄洋的嫌疑人不就是靠着高深的医学知识,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实验而为一次具有科技含量的犯罪行为做好了准备的吗?

让辩证法回归现实生活

黄志军

"让辩证法回归现实生活"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信念。这是以辩证法理解现实生活的理念,也是以辩证法改变现实世界的信念。换言之,今天的辩证法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思维领域和自然领域,不应仅仅是三大规律和几大范畴的表述,它要走向现实生活,要与现实的人发生关联,要植根于生活世界当中。"让辩证法回归现实生活"意味着,我们总是要寻求一些切实可行的途径,将辩证法与现实生活链接起来。在这里,我们试图把辩证法的教化性质和教养性质看成是这种链接的节点。

辩证法失去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变成了教条。自古希腊以来,辩证法便有对话之意,即通过对话这种方式来获取真理性的知识。通过语义的分析,发现事物之名称下面所蕴藏着的对立面,从而去伪存真,获得对事物的真理性理解。这或许是辩证法在当初受到追捧的关键原因。在那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不断的辩难和诘问,一个接一个的质问与反驳;在那里,没有任何权威,权威是获取真理的最大障碍;在那里,也没有最终掌握真理的人,因为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辩难与诘问,人们之间的关系获得了平等。在市民社会中,人们通过等价交换而培养了平等意识,而在辩证法的最初阶段,人们是通过对话、辩论和诘问而获得了这种意识。尽管苏格拉底最终遭受了"民主的暴力",但就他的"助产术"来说,乃是一种平等对话之术。这是辩证法在古希腊城邦中体现出来的教化性质,也可以说它一开始便承担着这种教化功能。

在后现代哲学看来,谈论事物的方式比据有真理更重要。而这种事关谈论事物的方式就是教化的方式,它意味着我们可以发现新的、较好的、更有趣的、更富成效的说话方式来交流、沟通和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化与说教、教育、教义区别开来。教化以一种反常式的话语,描述生活世界中色彩斑然的画面;教化不再灌输那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喃喃之语,而是力图通过准确的话语表达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进行沟通。所谓反常话语,绝不是自言自语,也不是失常的话语,而是在反思事物的内部结构,发现事物的对立面,从而在特定情景中用来表达事物新境况的话语,它是在事物的自我否定中诞生的。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常话语是解放话语,那么这种解放话语是对宗教压迫的反抗,是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否定。如果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反常话语是主体性话语、人道主义话语和解放话语的话,那么这些与人的自由、实践相关的话语,正是对"两个凡是"和"文革"反思的结果。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中那个喋喋不休的唐僧,那个啰嗦不堪的和尚,不正是陷入癫狂信仰中的说教者么?

教条是反辩证法的,而教化则是辩证法的。把辩证法当成知识,就可能把它当成教条加以背诵和传阅。知识是现成经验的总结,它渐行渐远地离开现实的实践,它不断地诱惑现今的人们一成不变地运用它。而教化从来不是现成的东西,它通过谈话,通过参与讨论,更新智慧,更迭时代。

辩证法的教化性质似乎能够让人们看到一种希望。这种希望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的可能性,而且还看到了在对话中人对自身的反思和批判。在人对自我的反身性批判中,乌托邦可以变成希望,甚至变成现实。乌托邦中的人不是生来就会这会那的人,不是不劳而获的人,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人,更不是无欲无求的人,他们的道德高尚性,他们的实践自觉性,他们的生活和谐性,就在于严肃而认真地以辩证法的态度反思自身。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人对自由、解放的渴望,就是对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蔑视和摧残人性之举的反思,再或者当今的人们对全球环境的关注和保护,就是对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之策的批判。人类批判和反思自身的实践案例提示我们,辩证法的存在使人类更具教养,不再野蛮行事,不再一意孤行,而是始终以人的自由、幸福和善为追求的目标。

可以说,辩证法的教养性就植根于人的生命活动本身中,它一方面以这种活动确证自我的力量,另一方面通过破除限制这些活动的约束和条件达到对自我的超越。事实上,所谓的现代性教养也只有在辩证法中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现代辩证法以理论思维的有限性和生活实践的无限性作为核心矛盾。如果仅以理论素养的高低作为现代性教养的标准,那么它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荒诞的。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表明,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如果把这句话看成是马克思对现代性教养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指的那些所谓有教养的阶级就是那些不把人当人看的阶级,就是那些靠榨取他人劳动成果而生活的阶级。他们脱离了大地的滋养,而靠他人的汗水和血液维持自身的存在,他们只局限在自身富有的世界中,而不让其他人也富有起来。这些人凭借着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自认为最有教养,其实只是不曾舔尝过大地味道的人,也是真正没有教养的人。于此,现代性教养固然表现为一种对生活世界的认知,但是这种认知是建立在它对生活实践的理解之上的。在笔者看来,辩证法的教养性质就在于理论思维不仅要有科学素养,更要有价值关怀,这种关怀指向的是变革人的存在方式、改善人的存在状态,以及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以上论述,我们意识到让辩证法回归现实生活,实际上是一个把辩证法奠基于现实生活世界中的过程,它不仅要确证现实生活的当下性,还要和生活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能够反思、批判和超越现实生活本身。一方面,我们确信能够发现更有趣、更有启发性、更富有成效的谈话方式来沟通和交流,在辩证法和现实生活之间便架起一道语言的桥梁;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现代性教养是人们在辩证地理解和改变事物的过程中形成的,辩证法的教养性不仅体现为理论思维的高超性,更表现在理论思维对现实生活的价值关怀上。简言之,让辩证法回归现实生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让它从纯粹的思维领域解放出来,让它的光芒能够照耀栖息于大地上的人们,并以人的幸福生活为旨归。